

您的一大论点是，尽管凡勃伦后来被视为局外人，但他实际上是最出色的学界中人。他一生都在学界度过，也完全是学术界的造物。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差异？

查尔斯·卡米奇：许多学者都想要把自己看作背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人物，想要自视为一个局外人，尽管并不那么可信。

在这个自远于学界的群体里，人们很容易想到凡勃伦。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美国社会学家)就是这样。虽然米尔斯和凡勃伦在智性上并不那么亲近，但如果要找一个据信因激进想法而被开除的人：一个痛苦的局外人，凡勃伦就成了人选，他成了一个很好的抓手，可以让人浇自己的块垒。虽然凡勃伦当年的情况不尽如此。

您将凡勃伦的时代描绘为一个“破坏偶像”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存在着对立的幻想？

查尔斯·卡米奇：那些后来将凡勃伦描述为局外人的人经常出来支持这种观点，说他的书写里透着反传统的语调。但是凡勃伦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在行文上都是这么好斗，却没有让他们成为旁观者清的局外人，反倒是强化了他们的中内人身份。我的朋友安迪·阿伯特(Andy Abbott)推测，叛逆的局外人身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法国艺术运动。

这个身份到今天还是很受欢迎，当然是有道理的。有不少遭遇卑鄙手段被排除在学术圈外的人，是真正的局外人。但是要拿这个词来描述那些两手一摊，在学院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只是感觉这个身份听上去很高蹈的话，就是对这个词的误用了。

凡勃伦的一个专业领域叫作“政治经济学”。这到底是什么专业呢？曾有人主张从以下角度回归“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家是海纳百川的，吸收所有学术研究，他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他们不认同当代社会科学之间的种种区别。”

查尔斯·卡米奇：如果你问一屋子经济史学家，那恐怕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这些术语演变甚巨。在出现我们称之为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之前，有一系列著作，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家庭管理的某些论述。“政治经济学”是向君主提供国家财政管理方面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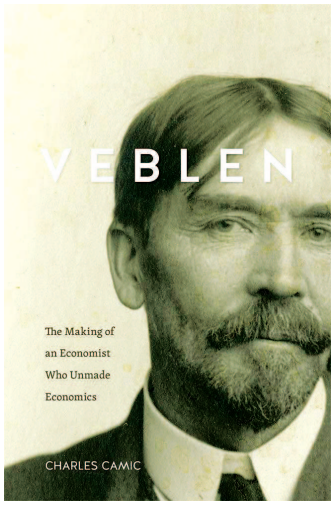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学”中，部分支脉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而一直持续到19世纪：就税收、关税，货币应当是黄金还是纸币等问题，向立法者提供建议。

19世纪后期，学者们进入了学院。他们主要是在对其他学者讲话，将其中一些旧问题嵌入更具技术性和理论性的架构里。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9世纪中叶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我们公认的经济学名著。他认为自己在为决策者提供建议。五十年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撰写了另一部伟大著作《经济学原理》。大体而言，选词上的这一变化背后是一个极其震撼的迁移——经济学话语的对象从最初的政策制定者，转变为专业学者。

“学术局外人”凡勃伦

编译/宋奇光



查尔斯·卡米奇《凡勃伦：一个“搅局”经济学家是如何养成的》(哈佛大学出版社, 2020)



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出生于一个从挪威移民来的威斯康州农民家庭。当时，以这样的背景读到博士并以教授为业看上去似乎不太可能，但凡勃伦从卡内基学院毕业后，充分利用了1870—188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出现这一契机，辗转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最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第二博士学位，且写出大量作品，包括《有闲阶级论》(1899)及《企业论》(1904)。凡勃伦后来被推举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

经济学上著名的“凡勃伦效应”指商品价格定得越高，消费者反而更愿意购买，即便有平价替代品——因为购买奢侈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展现经济实力，引人注目。这种感性购买也就是凡勃伦首先提出的“炫耀性消费”。他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写道：“在任何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

荣誉最后依据的基础总是金钱力量；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或保持荣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浪费。”凡勃伦受到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影响，怀疑自由放任主义，且强调文化的独特性，不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时他也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

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卡米奇(Charles Camich)近日推出《凡勃伦：一个“搅局”经济学家是如何养成的》(哈佛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在这部传记中，他指出凡勃伦的广采博收让他成为他那个时代受过最正规教育的美国人，也使他成为领导美式专业学术发展的理想人选——正是在这时候，以学术为业在美国社会图景中逐渐成为一条受到认可的职业路径(虽然凡勃伦本人因个人生活问题屡遭大学开除)。

本期“文汇报”特编译《高等教育纪事报》对卡米奇的访谈(Len Gutkin)，展现凡勃伦这位“学术局外人”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纠葛。

抓住的东西：改变，一切皆可变。无论我们谈论的是此时此地，还是另一个时地，都不存在那种相互间多少有些类似的所谓“经济学”。

历史学显然是追踪时间变化或变异的一个学科。凡勃伦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也涉足多个领域，在我们看来相当驳杂——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当然还有经济学。这就是非专业人士仍然爱读他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他也属于最早一批致力于学科专业化的人。

查尔斯·卡米奇：称凡勃伦为一个跨学科的学者，还是不太合适。他当然在各个领域受过训练，最毋庸置疑的，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他还同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合作。不过在当时，还没有所谓学科的概念。

在1880—1890年代现代学术界诞生之前，我们所谓的“领域”实际上只是对教授席位的称呼，而不是附属于系的。如果有个本地商人对政治经济学感

兴趣，他会愿意给耶鲁一笔钱，设立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教席。坐上教席的那个人，可能是出于各种原因——例如，那位出资的本地绅士恰好与他相识。而接下来，如果有人设立了一个社会学的教席，且薪俸更高，那么这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很可能就去当了社会学教授。

1880年代末及1890年代初，康奈尔大学的学科专业化日趋明确。但真正意义上的大爆炸式的系科创建是在1890年代初的芝加哥大学，当时凡勃伦恰好在那里。芝大正在专业化，而凡勃伦一如往常地敏锐。有人建议凡勃伦时不时要教点社会学，但他强调说：“我对社会学一无所知。”专业化发展需要很长时间。而一旦开始，则会像野火一样燎原。

凡勃伦的作品具有多学科的风格，不仅因为他接受的训练如此，也因为当时的普遍心态就是跨不同领域，当时许多学者都接受了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训练。他们强调可变性，并强调整体要大

访谈录

于各部分的总和。凡勃伦也在此列，但做了更为精心的设计，以解决经济学中越来越专业化的问题。

您提到了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 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的“交易区”概念，即学科之间的边界地带，在您的表述中，“相似之处只是表面的……尽管如此，却可以进行富有成效的群体间对话。”在凡勃伦的时代，哪些交易区特别活跃？

查尔斯·卡米奇：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有许多对话：谈论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性对话，还有人类学的对话，原始人类学家谈论世界各地的土著故事等等。这些对话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重叠，因为各学科之间没有明显而工整的壁垒。当时的交易区可谓五花八门。人类学家谈论的是“人性的可变性”，而生物学家谈论的是长时段物种特征的可变性。虽然身处同一个交易区，都在谈论可变性和变化，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谈论不同的东西。

在现代大学形成期间，交易区的深度和广度确实发生了巨变。1890年代是重大变革的时刻。1880年代，这些交易区是开放的，里面有许多自由贸易。但是到了世纪之交，这些区域就关闭了。

让我们谈谈凡勃伦的《论美国高等教育》，这本书批评了他所见的趋势——维持大学的运转越来越像经营一门生意。

查尔斯·卡米奇：它原来是1904年出版的《企业论》的一部分。凡勃伦将这本书里的一些想法用到了大学运营上。他脑子里想的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珀，哈珀心心念念着捐助人，还创办了一所商学院。凡勃伦对商学院的概念感到震惊。

《企业论》的内容被分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有两种解释。一是当时的出版商和现在一样，希望书短小一点，不要太长。另一种解释是，哈珀是这本书的审稿人，不想让芝加哥大学看起来像一家公司，所以他告诉出版商那一章必须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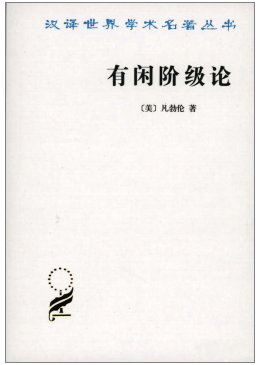
今天的学者可以从凡勃伦那里学到什么呢，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或经济角色？

查尔斯·卡米奇：凡勃伦觉得工作可以分为“工业”工作，指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和“金钱”工作，指为了牟利的工作。专业学者落在哪里并不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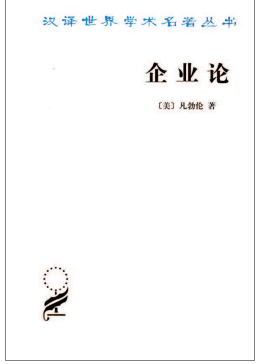
凡勃伦没能充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他也做不到。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简单的二分法上。不过在凡勃伦看来，专业学者是为了知识而生产知识，而不是为了工业目的或金钱目的。

凡勃伦曾经说，真正的思想是从天而降的意外所得。大学必须创造出适宜孕育这一奇迹的环境。任何其他目的，包括广受赞誉的为社会谋福利——对他来说都很成问题，因为这会妨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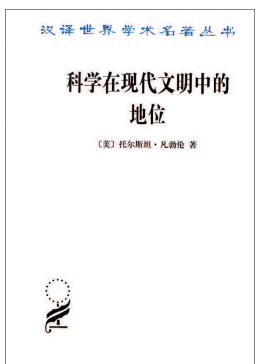
凡勃伦著作中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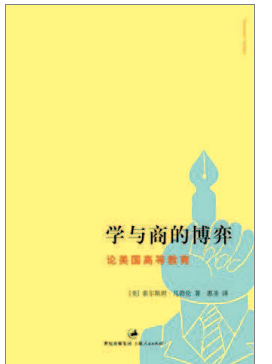
《有闲阶级论》



《企业论》



《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



《有闲阶级论：论美国高等教育》

三十五年后，依然感慨至深。

这

和当年黄老师及系里思想开明、无私提携年轻一辈学者的老师们的努力实在分不开。而我直到1987年春季学期才有机会上黄老师的“现代外国哲学”一课，就在新建的第四教学楼的三楼大教室里。大三、大四的学生不时会翘课，但黄老师这门，大家都认真真来上。除了我们班的同学之外，还有好几位来系里进修的外院校的老师和外系来旁听的学生。正如黄老师在回忆自己学术生涯的访谈中提到的：“现在高校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研究已经普遍和平复了，但当时开始的阶段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在很长时期被划为禁区。”他跟我们讲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萨特，尤其透彻地讲解萨特的思想。黄老师把“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等概念给我们做了耐心讲解。课后我细读全增嘏先生编的教本和从黄老师的课上记下的笔记，似乎领悟了，还在期末答卷上给以阐明。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在”和“自为”的区分却越越越模糊，我极力追忆当年黄老师就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所做的苦口婆心的阐述以求新的启迪。

当时虽然上过黄老师的课，却从来没有机会和黄老师一对一交流过，但大四时，我计划投考黄老师门下的硕士研究生。198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系里通知我到黄老师家去一趟，说是重要的事情商量。我有些不安，又带点兴奋，在暮色昏暗中灯光里穿过邯郸路，上了国年路，第一次走进了校园对面复旦第五教工宿舍。黄老师家就在一楼。在沙发坐上坐好定下心来，才发现张汝伦老师也在。黄老师开始跟我说：“现在高校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研究已经普遍和平复了，但当时开始的阶段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在很长时期被划为禁区。”他跟我们讲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萨特，尤其透彻地讲解萨特的思想。黄老师把“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等概念给我们做了耐心讲解。课后我细读全增嘏先生编的教本和从黄老师的课上记下的笔记，似乎领悟了，还在期末答卷上给以阐明。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在”和“自为”的区分却越越越模糊，我极力追忆当年黄老师就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所做的苦口婆心的阐述以求新的启迪。

1988年秋，我接着在复旦哲学系上研究生班，师从黄老师。之后

平凡中见真情

——怀念黄颂杰老师

李若虹



黄颂杰(1938—2020)

的两年里，黄老师第五宿舍里好的客厅成了我们同年同专业的五位同学常去常往见导师、听课的场所。黄老师待我们如同自己的儿女，不管是学业进展还是日常生活，事无巨细都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提携。他时时理解我们的难处，不断鼓励我们上进。每次上他家，一进客厅，那

氛围、那家乡菜味，如同回家。1989年冬天，又有一次申请大古奖学金的机会。这一次，黄老师更是关照有加，先吩咐我加紧进修。英语，又吩咐我在寒假留校准备迎考。学生食堂伙食清寡，于是黄老师特意从家里给我送来了鱼肉各类食品。他家里能吃到的年货，我

纪念

都有份。春天里，大古奖学金项目发来了好消息。黄老师特意为我从系里争取了研究生外出调研的机会，让我上北京加急考托福。转眼到了初夏，准备出国。这时正值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黄老师让我从他家抱来了电视机，放在南区宿舍和同学们一起看球赛。那年夏天，黄老师搬入第五宿舍。同学们一起帮黄老师迁入凉城新村，同贺乔迁之喜。和黄老师共享的那个夏日的喜悦和欢笑，清晰如昨。

黄老师送我出国深造后，相隔迢迢千里。未得常和黄老师保持联系实为本人做学生之过。2007年，我任职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时，有了和黄老师聚会的机会。那时黄老师担任《复旦学报》社刊的主编，他一如既往，全身心投入学报，正一心一意创办英文版。恰巧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份历史悠久的《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黄老师邀学兄学妹一起聚会，我带着学社的《哈佛亚洲学刊》，多年后再一次去凉城新村见黄老师叙旧。接着一些年，黄老师仍不忘关照我们，不仅抽空为学生写推荐信，而且还牵挂、关照身在国外的学生。他默默无闻地为下一辈的学生创造他自己年轻时没有的机会，为学生们铺开了一条条通衢。

2018年夏和黄老师匆匆一聚，未及细聊。道别时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和黄老师叙旧新闻旧事。现在细读他就自己思想历程做的访谈才知道，黄老师在“文革”之前完成了长达十年的严格学术训练，而且受教于全增嘏、胡曲园、严北溟和陈珪如等老先生，在同辈中实为难得。他年轻时打下的坚实学术基础使得他总能胜任教研重任，走在学界的前头。1957—1966年的十年寒窗后，他花了七年时间在西北大学研究伊斯兰教。以前没有机会听他介绍在伊斯兰教方面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其实，黄老师的第一份研究工作是“文革”期间在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而且一待就是七年，合作参与并翻译出版了一本书《巴勒斯坦、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还编了好多内部资料。这些训练和经历为往后发展复旦的哲学学科，尤其是推动西方哲学史研究实在不可分。后来他和刘放桐老师合作著成《现代西方哲学》课本，成为国内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不可或缺或入门书。同时，领衔创办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使复旦成为这一领域的教研重地。黄老师1988年应邀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系做访问教授时了解到，欧美大学设立哲学系相当普遍。他并深深体会到，哲学系不仅要培养哲学学科的学者，而是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为全校开设各种相关的公共选修课，以提高学生的素养。确实如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哈佛政府系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有关政治哲学的“论正义”一课和普鸣教授(Michael Puett)开设的“中国先秦伦理思想和政治理论”，均深受本科生欢迎。黄老师带来了一开放的视野给系里的课程设置带来了新的平台和机会，为后来二十多年哲学系的发展打开了开阔的前景。

黄老师一辈子悉心勤勉于哲学教研。几十年如一日的教研生涯里，他默默致力于学科的发展。1980年代中开始的复旦学术黄金时代也是哲学系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段。黄老师和系里一批兢兢业业的长辈学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学者。他分享自己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的体会时说：“哲学是个问号”，并谆谆告诫：哲学的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象，他仍然会以他固有的苦口婆心的语气和坦诚、真切的神态，接着娓娓道来：发现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在于以“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来探究问题本身。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意义，也正是黄老师一辈子全心全意从事教研、关爱、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的真谛所依，更是他平凡中见真情的品行的最佳写照。

黄老师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教研一辈子后，安抵山的那边，海的彼岸。那里没有病疫，只有青山绿水，愿黄老师安息。